

華文傳記
BIOGRAPHIES

楊成武與 董其武

下卷

張子申／著

浴血奮戰，保家衛國，在抗日戰場上雙雙立功；
爭鋒相對，你死我活，在解放戰爭中棋逢對手。
為國共統一戰線的建立從不同的道路走到一起。



Yang Chengwu Yu Dong Qiwu

華文
SINO-CULTURE PRESS
華文出版社



華文傳記
BIOGRAPHIES

楊成武與 董其武

下卷

張子申／著

華文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下 卷

第十章

绥远“九·一九”起义

绥远“九·一九”起义,是董其武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件。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主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其作战部队还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进入风扫落叶,席卷残敌的阶段。这时,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所谓“绥远方式”就是让孤立的国民党军暂时原地保留,不予打击,用充裕的时间去做其内部的工作,争取这部分国民党军在政治上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经过一段时间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进行改编,使之成为人民军队。

在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及傅作义的斡旋,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保安司令董其武,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于9月19日率绥远军政各界领导人及近十万国民党军通电起义。随后,起义部队接受改编,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并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

国的事业中做出卓越的贡献。

“绥远方式”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中的发展。这一方式的成功运用,对国民党军其他部队也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山西大同、陕西榆林、湖南长沙和新疆、云南、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纷纷相继起义,从而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董其武率部起义,起到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 一、董其武的愿望:走人民之路、和平之路 ◆

多年来,董其武养成了收听新华社广播的习惯,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之后,更是每天都要收听其新闻节目。1948年11月初的一天。董其武收听到东北全境解放的消息,预感到解放军势必源源入关,华北局势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随后,第三十五军被歼,接着第十一兵团和第一〇五军也被全歼,张家口解放,平、津、塘被分割包围,一则则消息,使董其武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

二十多年来,董其武对于傅作义来说,一直是唯言是听、唯命是从的。北平的出路,傅作义的出路,是和他息息相关的。这种形势下,对于坐镇北平的傅作义,他也做了几种分析。一是打,其结果,东北的大城市就是榜样;更要考虑的是,古都的历史遗迹,不能落千古骂名,傅是绝不会走此路的;二是走,南下,将完全依附于蒋介石,并不是傅所希望的;西撤,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又能对峙多久,不得而知;三是和,投向共产党。董其武根据自己与傅作义多年的交往,认为傅作义

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最大。但是,究竟走哪条路,还要看傅作义最后的决定,董其武无时无刻地不在注视着。因为北平的结局,傅作义的道路,将直接关系到绥远和他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就其个人愿望而言,他希望跟着傅作义,走和平之路,人民之路。

1月21日夜,归绥的千家万户都已入睡,为绥远前途安危而焦虑的董其武,从广播里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他虽然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在时间上仍然感到突然。瞬间,一种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张家口解放后,董其武曾两次打电话到北平,都不是傅亲自接的,一次是王克俊,一次是阎又文接的。他们只是说,傅作义很忙,心情不太好,注意掌握部队听候安排。这期间,董其武表面镇静,内心却有些惶惶然。此时更想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详情,随即打电话给总部,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面谒傅作义。

1月22日,万里无云,阳光灿烂。董其武乘坐专机到达北平,直接到中南海怀仁堂,见到傅作义。

“在这么忙乱的时候,你干什么来啦?”傅作义有些惊奇。

“正是这会儿,才要来看看您……”

“你来了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向你谈谈。”傅作义略微沉静了一下,便安详地说:“去年11月初,辽沈战役一结束,我去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那时淮海战役也即将开始。蒋先生想抓紧我部力量,以挽救残局。他先让何应钦,后是亲自告诉我,要求将华北部队南撤,并要我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的军队全归我指挥。我就当

时的处境,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华北的部队绝不能南撤,审时度势,咱们这部分军队到南方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对蒋的话也不能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当即向蒋婉转地表示:一、华北局势不像一般人看的那样悲观绝望;二、对扭转华北危局还有办法;三、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教训值得考虑!我的这些话打动了蒋。他当即表示尊重我的意见。”

“回到北平后。”傅作义长嘘之后说,“虽然在公开场合,我一再表示:要遵照蒋的命令,力挽华北局势,但是内心却认定南京政府已经丧尽军心,丧尽民心,绝不能靠这个政府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如果我们再继续参加内战,就无以对国家,无以对民族。不久,我就让大女儿冬菊通过和中共中央已经接通的关系,给毛主席去了电报,请派南汉宸或其他代表来平商谈和平事宜。”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片刻的停顿之后,傅作义说:“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的仗,不谅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特务可能要随时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拼着这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

他接着说:“我也不是不能走。蒋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软硬兼施地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了蒋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语,我都拒不接受。同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等也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他保证美国海军全力支持我们。我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能办得了。我们会找出妥善解决危机的办法的。’”说到这里,傅

作义加重了语气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董其武已经听过多遍，但此时重听，却感到格外亲切！他屏住呼吸，静静地聆听着，对于他来说，傅作义这时的话，真是一字重千钧啊！

“你回去后，”傅作义说：“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去是可以的嘛。现在呢，不要看目前解放的地方还不大，很快全国都要解放了，家属再送到哪里，也都不是好办法。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外国去，否则没有你立足之地。”

听到这里，董其武急切地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

董其武眼巴巴地盯着他说：“我多年一直跟随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傅作义点头表示同意。他又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是光几句话就成的，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要给大家讲明道理，认清利害关系，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必须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不虚此行，经过与傅作义的长谈，绥远的去向，实际上已经定下来了，这就是“走人民的道路”。对于董其武来说，剩下的问题

只是如何做好工作,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

奋斗目标已明,决心已定。董其武返回绥远后,暗中就开始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他也清醒地知道,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政府一定会对他产生怀疑,不放心绥远的部队,要进行干预,一定要提高警惕,谨慎行事。他还认真分析了绥远内部的情况,就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来说,情况也不尽相同,应该说绝大多数人是欢迎和平、反对内战的;但由于多年的封锁和反共宣传,许多人不了解共产党,有疑虑,也是正常的;在中上层军官和人士中,存在对立、恐惧的心理;特别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特务分子,会对和平进行阻挠和破坏。所以,情况是复杂的,如果准备工作做不好,时机不成熟,贸然提出和平起义,反会受到挫折,因而愤事。针对以上情况,董其武的做法主要是安定部队情绪,逐步进行思想说服工作,使思想认识趋于一致,一步步把政府和军队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

他首先找师、旅长以上军官谈了话,传达了与傅作义晤谈的情况,着重说明了三大战役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说明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北平的和平解放,傅作义的所作所为,顺乎历史潮流,顺乎人心所向,是完全正确的。希望大家要放开眼界,观察全国形势的发展,安定部队,团结一致,不要听信谣言。并提出绥远应向何处去的问题,征询了大家的意见。随后,他又与省政府厅、局长以上官员、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东四旗代表胡凤山、回族代表吴桐等分别谈了话。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赞同傅作义的决策,认为应该走和平之路,极少数持怀

疑态度,个别人暧昧无言,有的甚至有怒气。

为了掌握广大基层军官的思想脉搏,统一认识,稳定情绪,董其武提出一个时局讨论提纲,下发到各部队、机关,组织讨论。内容主要包括:

1. 当前国内外形势怎样?共产党的军队能否渡过长江?
2. 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爆发?
3. 对北平和平起义的看法如何?
4. 在当前形势下,绥远应该怎么办?

从讨论的结果看,大多数人认为:第一,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的军队可能很快渡过长江;第二,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幻想,是谣言,中国的统一、发展,不能寄希望于国外力量,我们不能当亡国奴;第三,北平和平解放是大势所趋,傅作义走的道路是对的,不然还是和天津一样;第四,在当前形势下,绥远要以北平为榜样,亦应走和平道路,不应再做无谓牺牲。显然,大多数人开始看清了形势,赞成走和平道路。但也有少数人认为:“蒋介石有美国支持,美国不会坐视不救,蒋介石不会失败;美苏矛盾很大,难以调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打起来,与共产党讲和靠不住,应固守绥远,等待时局变化。”还有人说:“北平和平解放,一切都完蛋了,绥远要坚持到底。”董其武认为少数人有顾虑、有幻想,甚至持反动立场,是不足为怪的。只要多做说服教育工作,这部分人也是可以分化的,最终坚持顽固立场,反对走和平道路的只是极个别人。

春节过后,董其武到部队和地方巡视,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要和军政官员和士兵交心谈心,举行小型会议,座谈讲话。更广泛地了解到基层人员一般是倾向和平的,部队的情绪是稳定的,但在军官和地方官员中确实顾虑不少。例如:共产党会不会信任、会不会使用、会不会算旧账,有没有人身安全保障等等;还有少数人对北平的和平起义不谅解,有抵触,甚至别有企图。看来和平道路的进程还是很艰难的。同时,董其武也了解到广大的各族人民是渴望和平,不愿打仗的。这次巡视,更加坚定了董其武走人民之路,走和平之路的决心和信心。

◆ 二、走和平道路的艰难历程 ◆

董其武从北平返回绥远不久,在绥东陶卜齐车站地区,解放军某部与董其武部发生武装冲突,战斗异常激烈,绥远局势顿呈紧张,归绥市内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董其武立即电告傅作义,使毛泽东作出“双方部队停止战斗,绥远问题和平解决”的指示,于是绥远局势又趋平静。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兼省政府建设厅长潘秀仁、副主任兼省政府财政厅长张遐民,竟然要求董其武立即将军政机关西撤。他们说,后套粮多,后方补给容易。不然一旦解放军切断绥包路,就无法西撤了。他们的用意是以西撤为托辞,妄图阻挠绥远走和平道路。董其武拒绝他们的要求后,他们几个人就逃到后套去了。

由于一部分人存在错误思想,少数人坚持反动立场,加上个别人的捣乱破坏活动,还有董其武认为时机不成熟,不便公开表明态度,使一些比较倾向和平的人,也对时局发展产生怀疑,对董其武产生误会,

如有人说：“董主席的葫芦里头到底装的什么药，倒出来让大家看看嘛！”甚至有人说：“董主席是脚踏两只船！”

解放后，董其武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过：“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与国民党政府方面制造的种种障碍和施展的种种阴谋上。我与广大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官兵和各界爱国人士，同他们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在绥远刚开始酝酿和平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分子就把情况密告南京政府。3月初，南京政府命令董其武率驻绥部队和政府西撤。这时，董其武已决心不再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但表面上还需应付。于是他找了两条理由回绝：一是绥远目前还算稳定，暂时不应西撤；二是驻绥部队的下级军官多为当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南京政府一看董其武不服从调动，马上改变了手法。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籍的祁子厚和董的同乡严子言二人，乘飞机到绥远，要接董其武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也被董其武不硬不软的托辞拒绝了。他对二人说：“当下时局表面稳定，但危机四伏，我一离开，局势难以控制，可能出现意外，如果必要，可酌请他人代表，目前不便轻易离绥。”祁、严二人只好悻悻而去。

南京政府两次碰壁后，便使出“杀手锏”，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绥远是一个贫瘠的省，财政短绌，断绝经济确实使军队立即陷入困境。董其武多次去电申请和派人交涉，南京政府不是不予理睬，便是故意推托，唯一的答复，就是“让董主席来”。某些不明真相的

人,听到后,说“董主席糊涂,到南京去一趟,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其实,董其武何尝糊涂,既然决心与南京政府彻底决裂,怎么能为了一时的困难而去求救于南京政府呢?何况蒋介石居心叵测,实际上这是给他设下的陷阱。只要董其武一离开绥远,形成群龙无首的局面,那些反和平的恶势力,便会猖獗起来,这是必然的。那些希望董其武去南京的人里,有些思想简单或者说是糊涂,有些则是别有用心,妄图乘机捣乱、兴风作浪,以激起不明真相的人反对董其武,以达到反对和平道路的目的。

对于暂时的经济困难,董其武想方设法与军政各界节衣缩食,共度时艰。钱不够用,只能给军官、士兵每人每月发五块和两块现洋的生活费,家属吃粮由政府供给;布匹紧张,无夏季军装可发,就改冬装为夏装。这样,上下齐心协力,始终没有被南京政府的压力所压倒。当然,这期间,董其武付出了不少精力,去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以坚定大家走和平道路的信心。

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晋北解放后,根据南京政府的指令,各地的特务麇集绥远,有如群魔乱舞,大肆进行反和平活动,成了南京政府破坏绥远起义的一支最猖獗的别动队。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北平来到绥远,专门进行安排布置,带着电台,潜入各部队各阶层,与部队、政府中的顽固分子相勾结,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的主要罪恶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从绥远酝酿和平之初,直到起义胜利,特务分子破坏起义的谣言始终没有停止过。如他们散布说:“第三次世界

大战快打起来了,今年明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就要率美军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军队很多,就要回国参战了。”还说:“你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绝对不要你们,你们再改造,再进步也不行。”有的甚至更恶毒地说:“共产党说了,血债要用血来还,等战争结束了,再来算老账。”对于这些煽动欺骗,董其武都及时给予揭露,使人们不被谣言所蛊惑。

游行示威,施加压力。为了制造声势,制造压力,特务分子伙同一些顽固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包头大街上游行示威,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呼喊反动口号,如:“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企图造成恐怖气氛,以动摇人们走和平之路的决心。

砸毁进步报馆,蒙蔽广大群众。绥远省政府机关报《奋斗日报》,在董其武的直接关照下,积极配合和平行动,一切言论均逐步向人民靠拢。不但宣扬和平革新,还刊登解放区胜利的消息和进步文章,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因此,被特务分子视如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封锁消息,继续蒙蔽绥远广大民众,他们纠集一部分人,于7月11日晚十时前后,到报馆大肆打砸,门窗、机器、办公设备多被捣毁;他们气势汹汹地搜索打人,编辑、记者、工人有多人被打伤。报馆被砸后,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和广大民众的义愤,董其武当即命令军长刘万春彻底追查。经调查证实,砸报馆的活动系第二五八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受特务煽动,蒙骗士兵二十余人所为。随后,针对不同人员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了处理。

妄图破坏铁路交通,另立山头,上山为匪。绥远铁路警务段长、军统特务康玉玺,伙同他的同党周晏等人,受其主子的指使,煽动不明真相的路警和工人,企图搞罢工,破坏机车、铁路、桥梁,利用警务段的枪支,拉到大青山为匪。董其武得知消息后,找到愿意走和平道路的车务段长高文藻,联系、团结多数职工粉碎了特务们的阴谋,保证了绥远铁路的正常运行。

封官许愿,制造分裂。在特务大搞各种破坏活动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采取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卑劣手段,破坏和平道路。七月间,国民党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们发电报,让董其武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飞机接他们三人到陕坝见面。

见面后,寒暄几句话之后,徐永昌便单刀直入地说:“董主席,实不相瞒我们来绥西的目的,就是要劝你尽早西撤……”

“劝董主席西撤,不仅是上方的命令,也是我们的心愿,这都是为董主席和近十万大军考虑啊!”王叔铭也说。

他们甚至荒诞地说:“西撤只是第一步,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的胜利。”

“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么?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想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董其武气愤地说。

徐永昌一听,马上说:“这是误会,这是误会!”

“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因为部

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董其武也改换了口气。

“我们回广州后，研究补发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徐永昌立即答应道。

为了应付徐、王以尽快得到补给，董其武便命令张世珍的独立第七师向西开到河套地区。这个师忠诚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董其武秘密对张世珍说：

“目前，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住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阻击解决。同时，在关键时刻，要防止西边各部队向我们进攻。”

“我明白了，请董司令放心吧！”张世珍心领神会。

董其武的做法，果然起到了迷惑国民党政府的作用，补发了欠饷，拨发黄金一千九百两，并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他当即电告傅作义，傅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说：

“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对于任命，董其武心中明白，这是南京政府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企图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他架空，使其在绥远失去兵权，以便操纵。董其武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发报称：

日前电拨欠饷及电委均已收悉，可解绥将士燃眉之急，并表示诚挚的谢委。遂请选派贤能来接替敝职的一切职务。